

#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屈直敏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

## 提要

本文通過疏理文獻和碑刻以及石窟中的造像資料，對三教造像的源流及其發展過程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初步分析和探討。經研究我們發現，三教造像在中國經歷了獨立造像、佛道混合造像、三教合一造像的發展歷程，這一過程與中國精英階層所倡導的三教融合之政治思想文化在時代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從而揭示了中國古代社會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關鍵詞：**石窟寺 造像碑 三教造像 三教融合

###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到東漢末三國而盛，雖然《後漢書》、《三國志》等史著均有關於漢代佛教流傳的記載，<sup>①</sup>但在書中對當時禮佛的秦景、蔡愔、竺法蘭、攝摩騰、安靜、支讖、竺佛朔等人都沒有立傳，而劉歆《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這類圖書目錄中也未曾記錄釋氏之學。由此可見，兩漢時期佛教雖然在中國已經開始流傳，但影響甚微。晉室南渡，佛學乃影響及於中國的上層學術界，其時僧人與名士互相傾倒，到南朝梁時，梁武帝崇佛，佛教始進入中國上層的政治權力核心。而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崇信佛教尤為殷勤，在《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中記載了大量關於念誦佛經可以免除災難的故事，<sup>②</sup>《梁書》記載了梁武帝崇佛的故事，《世說新語》亦記載了大量魏晉時期士人熱心佛理討論的事蹟。魏收著《魏書》不僅記載佛道之爭和魏武帝滅佛之事，而且還立〈釋老志〉述漢以來佛教的源流與演進。<sup>③</sup>自此以往，佛教便成為中國上下所信奉的一個大宗教，並逐漸與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佛教在與中國儒、道文化相互滲透和融合的過程中，遺留下了大量的造像遺跡。本文在此主要根據儒、佛、道三教造像遺跡來探討儒、釋、道的融合過程，特別是根據佛、道混合造像和中國石窟寺現存的三教合一造像來探討廣大民間信眾之中的三教融合。

## 一、三教造像源流及佛、道混合造像的發展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形像為先導，其造像大約始於西漢武帝時期，<sup>④</sup>東漢明帝時始有佛教造像的明確記載，<sup>⑤</sup>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轉盛，對此已有諸多學者論及，在此不再贅述。<sup>⑥</sup>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印度佛教

造像傳入中國在戰國中期，<sup>⑦</sup>由於文獻不足徵，暫且存疑。而儒、道造像，諸多學者認為源自於佛教造像的影響，<sup>⑧</sup>因而「仿佛造像說」為當前學術界廣泛認同且佔據絕對主流的地位。然而考其本，溯其源，我們則發現儒、道造像各自有其本土文化之淵源。

中國儒教造像，最早可能源起於祭祀活動，大約在春秋以前，祭祀時「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戰國之時「尸禮廢而像事興」。<sup>⑨</sup>可見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就已經有設像祭祀之舉。任榮據顧炎武《日知錄》「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的記載，認為「這是文獻記載中最早的儒像」<sup>⑩</sup>。但《漢書·文翁傳》並無設孔子像的記載，<sup>⑪</sup>關於文翁成都石室設像的記載最早見於《元和郡縣志》。《元和郡縣志》記成都縣文翁學堂引「李膺記云：後漢中平中，火延學觀，廂廊一時蕩盡，惟此堂火焰不及，構制雖古而巧異特奇，壁上悉圖古之聖賢，梁上則刻文宣及七十弟子。」<sup>⑫</sup>然而文翁石室講堂自西漢景帝至東漢安帝永初年間曾進行過多重建，故李膺記載石室設像之事是否為文翁所為難以確考。據傳世文獻考之，孔子及弟子造像較早的記載為東漢靈帝光和元年（178）「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sup>⑬</sup>《三國志·卷十六·魏書十六·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倉慈》註引《孔氏譜》載：「孔乂字元儒，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sup>⑭</sup>據此可知，最遲到東漢桓靈之世，儒聖孔子的造像已經存在。因為從西漢開始，朝廷便不斷地追謚或追封孔子及其後人弟子，皇帝親臨或派人到孔廟進行祭祀，於是隨著祭孔而興的是儒學先聖造像的興盛。兩漢以降，祭祀孔子成為國之大典，致使孔廟或文廟，甚至官私學堂均設孔像供奉。<sup>⑮</sup>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道教是中國本土興起的宗教，關於道教的形成，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思路：一、以漢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作為道教誕生的開始；二、以北方寇謙之的宗教改革與南方葛洪、陸修靜、陶弘景的宗教活動作為道教形成的標誌。<sup>①⑥</sup>由於道教形成的時代難以確考，這無疑給道教造像的研究帶來一定困難。目前學術界根據《老子道經上想爾注》所載：「道至尊，微而隱，無狀貌形像也，但可以從其誠，不可見知也」<sup>①⑦</sup>，認為中國早期道教不造偶像。<sup>①⑧</sup>陳國符先生認為南朝劉宋（420~477）時期「道教已有形像」<sup>①⑨</sup>。賀世哲先生亦認為道教「大約於公元5世紀上半葉開始造像」<sup>②⑩</sup>。所據資料均為釋法琳《辯正論》卷6〈九箴篇下·答九迷論·異方同制〉註引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誤，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13 釋法琳《辯正論》註引王淳《三教論》作「宋」）陸修靜亦為此形也。」<sup>②⑪</sup>然據《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福州永泰縣）洞官山」條記載：「縣東北六里，自武夷岩前，連岡接阜，晉祚中興，以王氣生于東南，乃詔掘斷山脊，皆有血流于羅浮，移老君聖像鎮于洞宮之下。」<sup>②⑫</sup>則漢末魏晉之際已經有老君造像。但是由於西漢初年盛行黃老學說，致使兩漢時期重視對老子的祭祀，因而我們很難說這就是道教造像，但後來道教造像中以老子為主尊的造像形式，與早期老子造像有著密切的淵源卻是顯而易見。到南北朝時期，道教完成了自己神譜系統的建構，<sup>②⑬</sup>道教造像隨之盛行。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sup>②⑭</sup>。又《太平寰宇記》「（河北道五衛州汲縣）老子祠」條引《後魏書》云：「鎮西將軍廉侯事道，於汲縣置立堂宇，鑄石為老子像而祠之。」<sup>②⑮</sup>該碑大約立於武定4年（546）。<sup>②⑯</sup>此外，據王子

云先生考證，「南北朝著名的道教像，根據歷史記載，有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所造玉清像，北魏正光二年（521）所造天尊像，北周天和三年（568）所造太清老君像等，惜現均已不可得見」<sup>⑳</sup>。同時，關中地區現存大量的北朝道教造像碑更加證明了這一時期道教造像的興盛。<sup>㉑</sup>

據史書記載，從漢代開始，中國歷代帝王、官吏以及平民百姓都是佛、道兼奉，將佛陀與老君（或天尊）等而供奉，東漢桓帝是浮圖、老子共祠。<sup>㉒</sup>到南北朝時期則普遍盛行佛、道混合造像，文獻中關於佛、道混合造像記載較早的是北周宣帝於大象元年（579）「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sup>㉓</sup>。而現存北朝造像碑中的佛、道混合造像則更早，最早見於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碑〉。<sup>㉔</sup>南北朝時期關中地區造像碑上的佛、道混合圖像已經有諸多學者研究，<sup>㉕</sup>在此僅據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南北朝時期佛、道混合造像碑的基本情況列一簡表附列於下：

表 1：北朝佛道混合造像碑簡表

朝代帝號	年代	造像碑	部分內容	收藏地
北魏太武帝	始光元年 (424)	魏文朗造像碑	佛弟子魏文朗造佛 道像 1 軀	耀縣博物館
北魏宣武帝	景明元年 (500)	楊楞黑造像碑	楊楞黑為父造石像 1 軀	耀縣博物館
	正始年間 (504-508)	田良寬造像碑	邑子等 45 人建石像	西安碑林博物館
	延昌元年 (512)	朱奇兄弟造像碑	朱奇兄弟 3 人等為父 母造石像 1 軀	西安碑林博物館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北魏孝明帝	熙平 2 年 (517)	熙平 2 年造像碑	道士呂榮孫等	西安碑林博物館
	神龜 2 年 (519)	神龜 2 年造像碑	太上君邑了茲茂盛 師徒	臨潼縣博物館
	神龜 2 年 (519)	劉田氏造像碑	道民數人、佛弟子數 人	臨潼縣博物館
	正光 4 年 (523)	師氏造像碑	宗邑子 71 人等立石 一軀	臨潼縣博物館
	孝昌 3 年 (527)	孝昌 3 年造像碑	太上道君石像一 軀，道士田神口、太 守龐口、道民龐道口	臨潼縣博物館
	熙平至武泰 (516~528)	夏侯氏造像碑	夏侯僧口合邑子造 石像 1 軀	耀縣博物館
		70 人造像碑	邑子 70 人等仰為二 聖建造石像 1 軀	耀縣博物館
北周明帝	武成元年 (559)	絳阿魯造像碑		耀縣博物館
北周武帝	保定 2 年 (562)	李曇信造像碑	佛弟子李曇信…… 敬造釋迦、太上老君 諸尊菩薩石像 1 軀	耀縣博物館
	建德元年 (572)	任閏造像碑	像主任閏	西安碑林博物館
		雷小豹造像碑	北面像主雷小豹、楊 洪義	耀縣博物館
		下元 3 年造像碑	仰為諸邑子等…… 秦土眾外道……	臨潼縣博物館

此外，佛道合一造像的石窟有宜君福地水庫石窟，位於今陝西省宜君縣五里鎮福地水庫中心島的斷崖上，造像年代為西魏大統元年（535），

正壁為佛龕，右壁為道龕，主尊為太上老君，左壁大龕殘毀，主尊不詳。<sup>③③</sup>

隋唐時期，佛寺和道觀中佛像與老君像並存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隋文帝詔為降（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載：絳州（今山西新絳）「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sup>③④</sup>。唐代三教並重，有鑑於此，唐中宗不得不於神龍元年（705）9月下令禁斷，其「制曰：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變，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卻，若有故留者，即科違敕罪」。<sup>③⑤</sup>由此可知，漢唐之際，佛、道並崇而混合造像十分盛行。

從上述三教造像的源流及形式來看，自漢至隋唐時期，三教造像經歷了從獨立造像走向佛、道混合造像的演進過程，但沒有出現儒、佛、道三教混合的造像形式。從造像內容與布局結構來看，在造像碑中基本上是佛、道平等並尊，但石窟寺造像中卻是以佛像為主尊，以道像配之。

## 二、三教合一造像的呈現和發展

從上述儒、佛、道三教造像源流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融合的造像形式鮮為少見。據現存文獻記載，較早的佛、儒合壁畫像是南朝梁時張僧繇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sup>③⑥</sup>。而三教圖像則有唐代孫位畫的「三教圖」、五代支仲元畫的「三教像」、宋代王齊翰畫的「三教重屏圖」等。<sup>③⑦</sup>另據宋·鄧椿《畫繼》卷8引〈銘心絕品〉載，吳道子、顧愷之、馬遠等也畫有「三教圖」，但這些三教圖像均已亡佚，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其內容難以確考。中國現存三教合一造像題材主要見於三教寺寺院和石窟寺中（關於三教寺寺院造像，擬另行撰文討論），現存石窟寺三教合一造像的時代基本上是隋唐以後，最早出現在宋代，以明清時期的造像較多，從石窟寺三教合一造像題材來看，以造釋迦牟尼、孔子、老子尊像為主，其造像結構布局大體可分為以下 5 種情況：

其一、在同一區域內三尊像各自開窟龕且窟龕並列的造像形式，如：重慶大足石篆山第 6、7、8 號三窟，沿崖一字排列開窟龕造像，依儒釋道順序並列，第 6 號窟鑿刻「孔子及十哲像」、第 7 號窟鑿刻「三身佛龕」、第 8 號窟是「老君像」，窟龕型制相同，時代分別為宋元祐 3 年（1088）、宋元豐 5 年（1082）、宋元豐 6 年（1083）；<sup>③⑧</sup>始建於元代，明清均有重修的甘谷華蓋寺，在現存 18 個洞窟中，第 13 號為太上老君洞、第 14 號為孔子洞，第 18 號為釋迦牟尼洞。<sup>③⑨</sup>

其二、3 尊像同窟（龕），但各據一壁且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重慶大足妙高山第 2 號窟，正壁雕釋迦佛，左壁雕老君，右壁雕孔子，時代約為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sup>④⑩</sup>

其三、3 尊像同窟（龕）同壁並列，以釋迦牟尼像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重慶大足佛安橋第 12 號窟，窟內正壁正中刻毘盧佛，左側刻老子，右側刻孔子，時代為宋代；<sup>④⑪</sup>南宋嘉熙 4 年（1240）的四川安岳大般若洞，正壁鑿釋迦牟尼像，佛像兩側分三層對稱造像，上層左右分別刻藥師佛、阿彌陀佛、十大弟子像，中層左右龕中分別刻老子、孔子坐像，下層左右分別刻佛、觀音像。<sup>④⑫</sup>甘肅莊浪韓店鄉三教洞石窟，正壁為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尊石造像，大約始建於宋元時期，現存有明嘉靖 2 年（1523）發願文。<sup>④⑬</sup>山東泰安司里山東崖南面下端宋嘉祐 2 年（1057）的「三

教通連龕像」；<sup>④④</sup>此外如南宋嘉定3年（1210）的大足石壁寺第1號龕、明清時期的大足光明殿摩崖造像、雙山寺第5號窟<sup>④⑤</sup>、陝西延安明嘉靖年間（1522~1566）石泓寺石窟第1號窟<sup>④⑥</sup>等多處都有這一形式造像。

其四、3尊像同窟（龕）正壁並列，以釋迦牟尼像為主尊，左右兩壁畫三教題材混雜的造像形式，如：天水仙人崖明清時期三教祠造像，正壁塑達摩、釋迦牟尼、惠能，釋迦牟尼像前塑孔子、老子像相對而列，殿堂內左壁繪剃度圖、孔子問禮圖、佛教題材畫各一鋪，右壁繪孔子講經圖、涅槃圖、道教題材畫各一鋪。甘肅鎮原石崖寺三教宮造像（已毀），據文獻記載，三教宮正壁供孔子、釋迦牟尼、老子像，左右兩側石階上雕十八羅漢像，內檐3公尺橫幅繪仙、僧、道人物形像圖，左壁繪孔子周遊列國故事畫，右壁繪封神演義故事畫。<sup>④⑦</sup>

其五、3尊像同窟（龕）正壁並列，但以老子像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甘肅平涼崆峒山始建於明嘉靖20年（1541）的三教洞造像，三教洞為窯洞式建築，正壁石台上塑老子、孔子、釋迦牟尼像。這類造像形式主要見於道教勝地。

從上述三教合一造像形式可以看出，宋代以降，三教合一造像經歷了從三教別龕並列走向三教同窟（龕）各立一壁、三教同窟（龕）同壁、同龕一壁並輔以三教題材繪畫的演變過程。從造像內容來看，三教合一造像，基本上是以佛像為主尊，儒、道聖像配之，同時也出現以儒、道造像為主尊的造像形式。

### 三、三教合一造像的歷史解析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儒、釋、道三教共存而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互相論爭，特別是精英階層和政治權力階層時有排佛之議，甚至有毀佛之行，但主張三教一致的思想卻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sup>④⑧</sup>傳統儒家道德倫理仍然是維護中國王朝政治的正統思想，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在從理論上論證，從實踐上奉行儒家之忠君孝親之倫理觀念，以維護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sup>④⑨</sup>到隋唐時期，三教並重，朝廷上下奉佛，崇信佛教達於極點，儒、釋、道三教逐漸走向融合，特別是在道德倫理方面漸趨一致。宋代以降，理學復興，無論是政治層面，還是教義、義理及思想層面，三教合一已為不爭之事實。<sup>⑤⑩</sup>佛教在中國政治權力核心中的地位式微，乃不復足以轉動整個政治社會之趨向，但卻為中國的世俗大眾廣為崇奉，並全面融入了中國知識文化體系之中。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佛、道相互抗爭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下層的大眾信徒們卻合力共建了大量的佛、道混合造像？為什麼在三教一致佔據主導地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卻沒有建儒、釋、道三教混合造像？為什麼在三教並重的唐代卻少有三教合一造像？為什麼在三教融合的宋代卻沒有完整意義上的三教合一造像？似乎這一切都只是據現存文獻，站在極高層面上觀察儒、釋、道三教，即從上層精英主流文化視角撰寫論文。這一點早已為荷蘭學者許理和所指出：「正如經常會發生的那樣，我們也許被一個事實所妨礙，這個事實就是我們能夠僅僅在極高的層次上觀察佛教與道教，即這種『職業的』宗教和他們在兩座金字塔頂端撰寫的經文。我們或許考慮這種可能性，即在低層次上這兩個金字塔的塔體融合為一個差異較少的世俗宗教，在極其基礎的部分這兩個系統很大程度上消散，成為一個通俗信仰與實踐的模糊的群塊。」<sup>⑤⑪</sup>

從上述三教造像的源流及佛、道混合造像的發展過程可知，儒、道造像各自有其淵源，在漢唐之際，佛、道混合造像雖然十分普遍，但儒、

釋、道三教合一造像沒有出現，這清楚地表現這個時期佛教與道教的結合與融合，而且十分清楚的是，這一造像特色在後來的石窟寺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承襲和發展，由此可知，這種結合的根源並不是石像的鑿造工匠所致，它們是歷史的，而不是藝術史。<sup>⑤2</sup>這為我們瞭解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兩種宗教在中國民眾心中的結合提供了有力的例證，同時似乎也說明了儒學仍然相對獨立於佛、道兩種宗教之外，而且具有相對尊崇的地位。

唐代石窟造像隆興，唐王朝實行三教並重的文教政策，然而闞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列13省100餘座石窟，<sup>⑤3</sup>黃海德〈中國古代西部道教石刻造像研究〉備列陝西、山西、甘肅、四川、雲南四省的道教石刻造像，<sup>⑤4</sup>均未見一座隋唐時期三教合一的石窟造像，這說明隋唐時期，雖然有儒、釋、道三教的造像，但三者基本處於獨立的造像。宋元時期，儒、佛、道三教之間的融洽關係日益見深，「合一」的思潮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於是出現了孔子、釋迦、老子三聖並祀於一堂的三教合一造像的三教祠或三教洞以及三教閣等，據文獻記載，三教祠的創建有可能興起於宋代，南宋·員興宗撰《九華集》（約成書於寶慶年間，即1225~1227）記載，上人照欲建三教殿，九華居士員興宗為說一偈以唱眾。<sup>⑤5</sup>但從這一時期現存的石窟寺三教造像內容來看，石篆山佛教造像以「三身佛」為主尊及弟子等，儒、道造像以孔子、老子為主尊及弟子，在同一區域獨自開龕並存。妙高山儒、釋、道三教造像皆以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為主尊及脇侍弟子，在同窟不同壁面並存。佛安橋、石壁寺、雙山寺等地造像均以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為主尊且同壁並列，僅略見三教合一之貌端。明清之際三教合一造像已然十分興盛。據舉人曹安於成化年間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1465~1478)所撰《調言長語》記載，明正統年間(1436~1449)「世人多以儒釋道為圖，或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sup>⑤⑥</sup>《山西通志》亦載正德13年(1518)平陽府知府閔槐撤三教祠改建蒼頡廟。<sup>⑤⑦</sup>特別是在嘉靖30年(1551)創立「三一教」的林兆恩於萬曆26年(1598)去世之後，民間紛紛修建三教祠，塑釋迦、孔子、老子及林兆恩像，春秋祭祀。於是明清之際，修建三教祠，祀孔子、釋迦牟尼、老子三聖一堂的三教合一造像遂盛極一時。<sup>⑤⑧</sup>而從這一時期現存的石窟寺三教造像內容來看，也出現了天水仙人崖三教祠、延安石泓寺等地的較為完整的三教合一造像，如天水仙人崖三教祠同殿內造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聖像，其左、右兩側造達摩、惠能像，殿堂內左、右壁繪儒釋道三教內容情節畫各一幅。三教祠不僅彩塑三教合一造像，同時還彩繪合三教內容故事於一幅之中的三教合一壁畫，是儒、釋、道三教造像發展所出現的一種新題材布局的新形式。從造像題材及布局來看，無論是較早的石篆山三教造像，還是較晚的仙人崖三教造像，都是以佛教為主導。由此可知，對精英士階層而言，三教合一的思想理論在唐宋時期已經成熟，但要普及得到民生大眾，還要經歷較為漫長的時段，這一點余英時先生早已指出：「程朱理學雖然把士階層從禪宗那邊扳了過來，但並未能完全扭轉儒家和社會下層脫節的情勢。明代的王學則承擔了這一未完成的任務，使民間信仰不再為佛道兩家所完全操縱。只有在新儒家也深入民間之後，通俗文化中才會出現三教合一的運動。」<sup>⑤⑨</sup>

綜上所述，中國的三教造像從漢魏到明清經歷了四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即漢魏之際的三教獨立造像，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佛、道混合造像，宋代以佛像為主尊和儒、道並尊的石窟造像，明清時期的三教合一造

像。這反映出了中國儒、釋、道三教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經過長期的並存和融合，到明清時期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才實現了全面的合一。同時從三教造像與思想理論的不同步，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 【註釋】

- ①參見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楚王英》、《後漢書·卷三十下·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襄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428~1429、1075~1085頁。西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魏書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註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四·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劉繇》（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59~860、1183頁。
- ②參見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魏齊周隋書并北史·誦經獲報》（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第202頁。
- ③參見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025~3055頁。
- ④東漢·班固，《漢書·卷五十五·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霍去病》、《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有關於「收休屠祭天金人」、「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記載，唐·顏師古註認為金人即「佛像」，參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79、3768~3769頁。
- ⑤參見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026頁。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載《文物》1980年第5期，第68~77頁。
- ⑥參見張總，〈中國早期佛教造像〉，載《美術研究》1989年第4期，第80~87頁。金維諾，〈漢魏時期佛教造像遺迹〉，載《雕塑》2003年第5期，第48~50頁。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 ⑦參見張正明、院文清，〈戰國中期曾有佛教造像傳入南楚〉，載《江漢論壇》2001年第8期，第66~69頁。
- ⑧參見丁明夷，〈談山東博興出土的銅佛造像〉，載《文物》1984年第5期，第32~43頁；又〈從強獨樂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載《文物》1986年第3期，第52~62頁。巫鴻，〈早期中國藝術中的佛教因素〉，載《亞州藝術》卷47（1986年）第263~376頁。
- ⑨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四·像設》，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
- ⑩任榮，〈儒教造像源流〉，載《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4期，第11~15頁。
- ⑪參見東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第五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25~3627頁。
- ⑫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二·劍南道·成都府·成都縣》，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總志之屬》。
- ⑬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五十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998頁。
- ⑭西晉·陳壽，《三國志·卷十六·魏書十六·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倉慈》（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14~515頁。
- ⑮關於歷代對孔子的祭祀，參見范小平，〈中國孔廟發展史簡論〉，載《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第41~44頁；張曉旭，〈中國孔廟研究專輯·一、中國孔廟發展史綱〉，載《南方文物》2002年第4期，第1~4頁。
- ⑯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4編第3節〈清整道教：關於道教思想、知識與技術的宗教化過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67~469頁。
- ⑰斯6825V《老子道經上想爾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頁。
- ⑱參見王宜峨，〈道教的造像藝術〉，載《中國道教》1989年第1期，第35~39頁。

- 頁。
- ①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附錄二 道藏劄記·道教形像考原》（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93~294頁。
- ②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 十六國北朝卷》，第8章〈莫高窟第249窟窟頂主要圖像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6頁。
- ③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六·內九箴篇第六·答外九迷論·內異方同制指八》，《大正藏》第52冊，第535頁中。
- ④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江南東道十二·福州·永泰縣》，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總志之屬》。
- ⑤葛兆光先生認為梁·陶弘景撰《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簡稱《真靈位業圖》）是「道教第一個完整神譜」。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4編第3節〈清楚道教：關於道教思想、知識與技術的宗教化過程〉，第486~492頁。
- ⑥唐·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94頁。
- ⑦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河北道五·衛州·汲縣》，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總志之屬》。
- ⑧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六十·石刻文字三十六·東魏·共城石像碑》，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
- ⑨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冊》第5章第3節〈佛教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97頁。
- ⑩參見李淞，〈關中一帶北朝道教造像的幾點基本問題〉，載《新美術》1997年第4期，第37~49頁。黃海德，〈中國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93~103頁。
- ⑪參見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七·孝桓帝紀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20頁。
- ⑫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七·帝紀第七·宣帝》（北京：中華書局，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1971年)第121頁。

- ③①參見耀生，〈耀縣石刻文字略志〉，載《考古》1965年第3期；韓偉、陰志毅，〈耀縣藥王山的佛道混合造像碑〉，載《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5期等。但日本學者石松日奈子認為該碑的製作年代在500~514年之間，參見石松日奈子著，劉永增譯，〈關於陝西省耀縣藥王山博物館藏「魏文朗造像碑」的年代——始光元年銘年代新論〉，載《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7~117頁。
- ③②參見張燕、趙超編，《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天津出版社，1996年）；李淞，〈關中一帶北朝道教造像的幾點基本問題〉，載《新美術》1997年第4期，第37~49頁。
- ③③參見李淞，〈西安附近的佛教造像遺迹〉，載《西北美術》1995年第3期，第20~21頁；後收入李淞，《陝西佛教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第20~22頁；又《陝西古代佛教美術》（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18頁，《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53~484頁。
- ③④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文帝詔為降（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大正藏》第52冊，第378頁中。
- ③⑤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釋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75頁。
- ③⑥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七·梁》；又《宣和畫譜·卷一·道釋一》亦載張僧繇畫「盧舍那及孔子像」（《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
- ③⑦《宣和畫譜·卷二·道釋二·孫位》，《宣和畫譜·卷三·道釋三·支仲元》；《宣和畫譜·卷四·道釋四·王齊翰》，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
- ③⑧參見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編著，《大足石刻研究·下編 大足石刻內容總錄·石篆山部分》（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

529~530 頁。

- ③⑨參見王來全，〈甘谷華蓋寺〉，載《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1期，第153~157頁。
- ④⑩參見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編著，《大足石刻研究·下編 大足石刻內容總錄·妙高山部分》（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554~555頁。
- ④⑪參見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編著，《大足石刻研究·下編 大足石刻內容總錄·佛安橋部分》（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568頁。
- ④⑫參見汪毅，〈從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論其思想性和文化意義〉，載《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1期，第104~106頁。
- ④⑬參見程曉鐘、楊富學，《莊浪石窟》（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49~51頁。
- ④⑭參見張從軍，〈司里山摩崖造像展現三教合一思想〉，載《走向世界》2005年第5期，第72~75頁。
- ④⑮參見鄧金之，〈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載《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第34~42頁。
- ④⑯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管會，〈郿縣石泓寺、閣子頭寺石窟調查簡報〉，載《文物》1959年12期，第19~22頁；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陝西名勝古迹》（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9~372頁。
- ④⑰參見政協文史科，〈石崆寺〉，載甘肅省鎮原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鎮原文史》第1輯（1994年）第155~158頁。
- ④⑱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儒、釋、道三教之關係，主要有鬥爭說和融合說。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3卷第1章〈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與佛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124頁。韓林，〈從三教之爭看道教的政治觀演變進程〉，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12期，第155~156頁。從宋立峰，〈唐代佛道二教之爭分析國家在文化交流

從三教造像的演進看儒釋道的融合

- 中的作用〉，載《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74~76頁等。
- ④⑨參見華山，〈自漢魏至宋初的儒佛道三教關係和道學的形成〉，載《山東大學學報》1963年第2期，第17~42頁；陳朝暉，〈試論北朝儒佛道的初步融合〉，載《東嶽論叢》1990年第6期，第21~25頁；聖凱，〈論佛儒道三教倫理的交涉——以五戒與五常為中心〉，載《佛學研究》2004年，第218~227頁。
- ⑤⑩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增訂版）；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學》（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許凌云，《中國儒學史 隋唐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凌慧，〈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載《安徽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第117~120頁；楊軍，〈宋元時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載《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第96~99頁，等等。
- ⑤⑪Zürcher, Erik,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oung-pao* 66 (1980), pp. 84~147 (許理和，〈佛教對早期道教的影響〉，載《通報》卷66，1980年，第84~147頁)。
- ⑤⑫參見[美] J. M. 詹姆斯著，李淞譯，〈中國早期佛道混合造像的一些圖像志問題〉，載《廣西藝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5~9頁。
- ⑤⑬參見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⑤⑭參見黃海德，〈中國古代西部道教石刻造像研究〉，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93~103頁。
- ⑤⑮參見宋·員興宗，《九華集·卷二十一·偈子·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
- ⑤⑯明·曹安，《調言長語》，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
- ⑤⑰參見清·石麟等，《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祠廟一·（平陽府）臨汾縣》，收入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

- ⑤⑧參見林國平，《林兆恩與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 ⑤⑨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文集·第三卷 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0頁。